

◎地藏信仰与佛教中国化研究

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兼论佛教的儒学化与大乘菩萨精神

洪修平

内容摘要：外来佛教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中国佛教具有独特性和中国化色彩，并不影响其仍然是“佛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鲜明的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和精神，也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修齐治平的抱负和理想，是大乘佛教自度度人、自觉觉他菩萨精神在中土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文化土壤。佛教儒学化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乘佛教得以在汉文化圈传播发展、大乘菩萨精神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路径。菩萨的特殊信仰既表达了民众百姓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借助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传播发展并充分展示其“慈悲为本”的独特魅力。在“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推展中，在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未来发展中，契理契机仍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大乘菩萨精神则应得到更广泛的弘扬。

关键词：佛教中国化 中国化佛教的特色 契理契机 佛教儒学化 大乘菩萨精神

作者简介：洪修平，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外来佛教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不同的途径与方法。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儒佛道三教关系视域下中国特色佛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 18ZDA233）的阶段成果。

展，最终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这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中国化的佛教表现出了许多独特性，但这并不影响其仍然是“佛教”。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佛教儒学化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乘佛教得以在汉文化圈传播发展、大乘菩萨精神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路径。菩萨的特殊信仰，则既表达了民众百姓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借助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传播发展并充分展示其“慈悲为本”的独特魅力。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契理和契机仍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大乘菩萨精神，则应得到更广泛的弘扬。本文拟从佛教的中国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及其契理契机、佛教的儒学化与大乘菩萨精神，以及人间佛教与菩萨精神等四个方面来对上述观点略作论述。

一、佛教的中国化与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主席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指出：“中华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他特别提到了佛教：“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①

习近平主席在这里提到了“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和“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从文明交流互鉴和思想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就是佛教中国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外来佛教正是经历了中国化的过程，才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

从历史上看，佛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呈现出了极其错综复杂的情况，通过了各种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它不仅表现在宗教信仰、哲学理论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礼仪制度、组织形式和修行实践等许多方面^②。就佛教中国化的途

①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载《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第003版。

② 中国台湾学者李志夫教授曾从“佛教教义、制度之中国化”“佛学之中国化”“佛教文学之中国化”和“佛教艺术之中国化”等四个方面对佛教的中国化作了专门的研究，请参见其《佛教中国化过程之研究》一文，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八期，1995年7月。

径与方法而言，也可以从佛典的翻译、注疏和佛教经论的讲习等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同时，由于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习俗等，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了汉地佛教、藏传佛教和傣族等地区佛教三大支，佛教的中国化，一定意义上也可说就是佛教的汉化、藏化和傣化”^①。

笔者曾从思想理论的层面，把汉地佛教的中国化概括为方术灵神化、儒学化和老庄玄学化等三个方面。当然，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并存并进的，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物和不同的思想体系中又各有侧重。^②

所谓佛教的方术灵神化，主要是说佛教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依附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宗教观念的融合吸收。外来佛教对神仙方术的依附，对中国传统宗教观念的融合，在客观上为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开拓了道路。

佛教素有“哲学的宗教”之称，其在中国的发展，还经历了十分重要的老庄玄学化的过程。汉译佛经从一开始就借用了许多传统道家的术语，例如《安般守意经》中就用“气”来概括“四大”，代指“人身”，用“无为”来表示涅槃义，以至于有的中国人就以道家思想去理解佛教了。牟子《理惑论》中就说：“佛与老子，无为志也”，认为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魏晋时期，玄学盛行，佛学与玄学合流而产生了玄学化的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正是通过与玄学的合流，佛教正式登上了中国学术思想的舞台。

佛教的儒学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与调和；二是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与吸收。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予以展开说明。这里只想强调两点：

第一，正是在与儒、道文化融合发展的中国化过程中，中国佛教融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思想文化，从纵向上看，大体经历了先秦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不同的阶段；从横向上说，它经过上千年的演变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儒家为主、佛和道为辅的“三教合一”的基本格局，儒、佛、道三教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三大主干。如陈寅恪先生所曾说：“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三教之说，要

^① 方立天：《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参阅拙文《论汉地佛教的方术灵神化、儒学化与老庄玄学化——从思想理论的层面看佛教的中国化》，载《中华佛学学报》第十二期，1999年。

为不易之论。”^① 中华传统文化在多民族融合、多文化交汇中不断地演化发展，表现出了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充满活力。

第二，佛教中国化是佛教与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的过程，外来佛教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成功典范。外来佛教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为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而不断改变自己，传统文化也在外来佛教的影响下不断发生变化，这两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强调佛教中国化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的佛教化也是不应被忽视的。只有从两者的双向互动中，才能更好地从文明交流互鉴中把握中国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更好地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更好地把握中国佛教的未来发展^②。

二、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契理契机

“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具体来讲，中国佛教有哪些独特性呢？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首先，从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佛教的独特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一些方面：一是形成了以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二是肯定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三是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四是崇尚简易性。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五是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不断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形成了显明的调和性特点。六是佛教内部的融合性。七是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③

其次，如果从“哲学的宗教”角度看，博大精深的佛学传至中土后，经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佛学思想和中国佛学的独特精神。其主要表现为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实践精神等多个方面，其中圆融精神、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最主要方面。圆融精神的主要内涵表现在中国佛教的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想，“立破无碍”“会通本末”等判教思想，以及中国佛教“三谛圆融”等理论学说等方面。伦理精神则在中国佛教伦理的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和孝亲观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中国佛教对

①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3页。

② 请参阅拙文《从三教的交互融合看动态的国学——兼论佛教的中国化与中国文化的佛教化》，《道家文化研究》第32辑，中华书局，2019年。

③ 请参阅拙文《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南京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孝亲观的强调，成为中国佛学伦理精神融合吸收儒家伦理精神的突出表现。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是最值得关注和加以强调的。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但佛教的终极理想，仍然是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其业报轮回观念中也透露出了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积极意义。只是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性和人生的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体现在禅宗和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①

佛教虽有“哲学的宗教”之称，但它毕竟是宗教，信仰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对人能够觉悟解脱的信仰构成了佛教的本质特征。但佛教与一般宗教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解脱是“慧解脱”；佛教的全部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信奉佛法而修行从而获得智慧实现解脱这一根本目标展开的。中国佛教在信仰方面的特色也值得注意。例如与中土善恶报应观相结合而形成的天堂地狱轮回报应说，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信仰，其中蕴涵着中国佛教的独特精神，即强化道德行为的责任感、每个人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再比如，中国佛教特别强调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对人心、佛性和解脱做了特别的发挥，从而与儒道分别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如古人所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②，并由“唯其心净，则佛国清净”发展出了人间佛教和建立人间净土，从而为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国佛教在信仰方面的特色还鲜明地表现于对佛菩萨的崇拜，这既是大乘菩萨精神深入社会人心的表现，也是大乘佛教与儒学精神相契合的生动体现。对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予以讨论说明。

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以上种种中国佛教的特点及其精神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内在的根据主要有佛教“应病与药”“随机设教”的方便法门等，其突出的外因则有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王权政治力量的强大、宗法伦理影响的深远和思想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主义精神等。正是诸多的内因与外缘，促成了中国佛教的独特发展。而中国佛教的独特发展和中国化特色，并不影响中国佛教仍然是“佛教”。这里的根本和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佛教有着怎样的文化外衣，藉着怎样的文化载体，其随机教化的方便与印度是否一样，而在

^① 请参阅拙文《论中国佛学的精神及其现实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

^② （元）刘谧：《三教平心论》引南宋孝宗皇帝语。这既是对儒佛道三教实际发挥作用的概括，其实也指出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三教各自的理论局限性。

于其根本的宗旨与佛陀创教的本怀是否一致。佛教的“真俗二谛”说和禅宗的“藉教悟宗”等为我们做了很好的提示，大乘佛教强调的“随机”和“方便”则是佛教“中国化”的内在理路和依据。从中国佛教的发展来看，契理和契机始终是佛教中国化的根本原则。佛教的中国化，其实就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契理”和“契机”。契理，就是从根本上始终合乎佛法的根本道理，契合佛法的根本精神；契机，就是随顺时代的变化和大众的不同需要而不断地更新和发展，并应机接物，方便施教。佛教的缘起、无我、智慧解脱，可以通过儒道化的“法性论”（慧远）、“法界论”（华严宗）或“见性论”（禅宗）来接引众生，开示众生。历史地看，契理和契机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推动着佛教的中国化。中国佛教正是在既契理又契机中保持了它持久的生命力，一直从古代走向了现代。

三、佛教的儒学化与大乘菩萨精神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和基础，儒学鲜明的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和精神，也对佛教的中国化产生重要影响。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理想，是大乘佛教自度度人、自觉觉他菩萨精神在中土生根开花结果的重要文化土壤。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儒学化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大乘佛教得以在汉文化圈传播发展、大乘菩萨精神得以深入人心的重要路径。

如前所说，佛教的儒学化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名教的妥协调和，以及对儒家人文精神和心性学说的融合与吸收两个方面。佛教本来是一种出世解脱的理论，这与中国儒家关注现实社会人生而重视君臣父子之道、仁义孝悌之情以及修齐治平的道德政治理想在表面层次上无疑是矛盾冲突的。而佛教徒不娶妻生子，见人无跪拜之礼的出家修行方式，更被认为与传统的社会伦理不合。因此，佛教初传，就受到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排斥和攻击，被斥之为不忠不孝，违礼悖德。但事实上，大乘佛教的入世救度众生与儒家的人文精神在深层次上可以说是异辙而同归。

因此我们看到，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发展，始终对儒佛关系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说明，并努力对儒家伦理名教采取了妥协调和的态度，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寻找相似点，以说明“释教为内，儒教为外”^①，“内外两教，本为一体”，例如把佛教的“五戒”比同于儒家的“五常”，认为两者是“异号而一体”^②的。

① （北周）道安：《二教论》，《大正藏》第52册，第136页下。

② （北宋）契嵩：《辅教编》上《原教》，《大正藏》第52册，第649页中。

其二是调整自己或适当做出变通，以求与儒家伦理相适应，有关这方面的突出例子就是中国佛教对“孝道”的阐扬。重视孝道，突出孝道，成为中国佛教伦理的一大特色。其三是沟通不同点，努力从两者都有助于社会教化的角度强调“周孔即佛，佛即周孔”^①，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当然，如果两得的差异太大，中国佛教也会以“苟有大德，不拘于小”^②来回答。随着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发展，佛教的儒学化也逐渐从表面层次的对儒家纲常名教的妥协调和，进一步发展为深层次上的对儒家重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和思维特点、思想方法的融合吸收，特别是通过与儒家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沟通而使大乘菩萨精神深入人心。

以儒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烈的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生的人文精神”^③。这种精神在儒家思想中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强调人的价值，重视对人的本质和人性的探讨，强调主体道德上的自觉完善，形成了以性善论为主流的人性学说和反身而诚的道德修养论，并提倡积极入世，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豪迈气概和人生担当，其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精神，与大乘佛教入世救度众生的菩萨精神，特别是地藏菩萨“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慈悲大愿，根本精神完全一致。再加中国传统宗教有着神灵崇拜的悠久历史，当人们以此观念去理解并接受佛教时，就很容易会把佛教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佛教初传时人们认为佛陀能分身散体，飞行变化，通过祭祀能向佛陀祈求福祥，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观念逐渐促成了延续至今民间的菩萨信仰和烧香拜佛活动，四大菩萨及其显灵说法的四大名山几乎家喻户晓，这既表达了民众百姓向往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化佛教借助于儒学的人文精神传播发展并充分展示其“慈悲为本”的独特魅力。

正是在儒家的仁爱和“修齐治平”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精神影响和引发下，中国佛教充分拓展了印度佛教本身蕴涵的却又被整个思想体系窒息着的对人和人生的肯定，并以此为契机而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华文化融合互补，以其独特的大乘佛教精神与儒、道一起入世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著名高僧圆瑛法师曾强调：“我佛设教，以慈悲为本……佛教大乘菩萨，视大地众生皆为一子。慈运无缘，

① （东晋）孙绰：《喻道论》，《大正藏》第52册，第17页上。

② （东汉）牟子：《理惑论》，《大正藏》第52册，第2页上。

③ 请参见拙文《论中国佛教人文特色形成的哲学基础——兼论儒佛道人生哲学的互补》，《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1-2期。

悲舍同体，平等普度。”^①这种慈悲精神与儒家的仁爱“教殊而道契”^②：“佛以慈悲为本，儒以仁义为归，佛儒之为教，虽则不同，而其利生救世之心，未尝有异也。”^③由于佛教的慈悲是一种基于平等无二的对万物众生的慈爱和悲悯，因而对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思想也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丰富了中国传统的仁爱观。

我们看到，外来佛教作为一种追求出世解脱的宗教，在儒家重人事、重心性和重视主体及其修养的思想影响下，将抽象的佛性与具体的人心人性结合在一起，极大地发展了中国化的佛性论和心性学说，并通过对主体自我的肯定而一步步走向了对人的生活的肯定，由此而确立了中国佛教“出世不离入世”“入世以求出世”的基本特色。而儒学本身具有的“人文性与宗教性的两重性”，又对中国社会接纳外来宗教和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大乘佛教在华成功传播的重要条件”^④。

四、人间佛教与菩萨精神

近现代发展起来的人间佛教思潮，一方面可以追溯到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另一方面也是佛教界有识之士有感于自晚明以来整个中国佛教的衰败，为顺应现代社会与文化的急剧变化而作出的积极回应与自觉调整，同时也是对唐宋以来中国佛教人生化、入世化倾向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佛教的入世化、人生化倾向，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说，是大乘佛教的入世精神在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中国佛教所倡导的“出世不离入世”，实际上是印度佛教的“出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在“人间佛教”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推展中，在佛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未来发展中，契理和契机仍应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大乘菩萨精神，则应该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弘扬。

事实上，人间佛教的入世面向，这本来就是大乘佛教基本精神的体现，也是中国化佛教的重要特色之一。大乘佛教自度度他、自觉觉他的根本情怀和上求菩提下化众生的菩萨精神，在印度佛教中未能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传入中国后，在具有浓厚人文精神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但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面向，有与历史上的“入世”不同的时代境遇、丰富内涵、新的特点及历史效应。就其历史境遇而言，它是在明清佛教衰落腐败、

① 明旻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第147页。

② （梁）刘勰《灭惑论》明确提出：“孔释教殊而道契。”《大正藏》第52册，第51页中。

③ 明旻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上海圆明讲堂，1989年，第268页。

④ 请参阅拙文《殷周人文转向与儒学的宗教性》，《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9期。

大乘精神失落而又遇国家民族危机、西方科学民主思潮冲击的多重压力下寻求的自救，比起佛教初传遭遇儒道的抵制而求生存发展，情况更为艰难复杂。就其内涵而言，入世不仅是与社会文化和民众生活的结合，更需在回应转型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理性、民主政治、学术研究等提出的一系列挑战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发展空间，在继承发展传统佛教入世精神的同时寻求新时代的拓展和创新。由此，我们看到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入世，表现出了许多区别于传统历史入世的新面貌、新特点，并推动中国佛教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在这过程中，许多高僧大德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弘扬大乘菩萨精神的重要性。

例如王恩洋就特别指出：“佛法者，发大菩提心，发大悲心，自未得度而先度他，三大僧祇皆为度众；是故菩萨不舍众生，不出世间，宁自入地狱而不愿众生无间受苦。”^①

太虚法师倡导佛教改革运动，提倡菩萨行就是他佛教改革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他曾认为，中国汉地的佛教衰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大的病源是空谈大乘，不重实行，行为与教理完全脱离。所以革新中国佛教，就要祛除佛教徒好尚空谈的习惯，使教理融汇到服务社会民众中去。他认为，“菩萨行”就是“要从大乘佛教的理论上，向国家民族、世界人类实际地去体验修学”^②，而这菩萨行要能够适应今时今地今人的实际需要。具体地说，“今菩萨行的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的工作（如出家众可参加文化界、教育、慈善界等工作，在家众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都去参加），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教徒之益。佛教的细胞散布于社会每个阶层，全不和国家社会民众疏远分隔。”^③

印顺法师也大力提倡“从广修利他的菩萨行中去成佛”^④的大乘精神。他将菩萨道视作佛法正道，将菩萨行视作人间正行^⑤，在他看来，人间佛教的核心即是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人间佛教就是“从人间正行去修集菩萨行的大乘道”，“人生正行即是菩萨法门”^⑥，从而将佛法与人间善法密切结合起来。

赵朴初居士则将五戒、十善、四摄、六度作为人间佛教修行的重要内容，主

① 王恩洋：《佛学论丛》，《王恩洋先生论著集》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2页。

②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19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③ 太虚：《太虚大师全书》第19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95页。

④ 印顺：《佛在人间》，《妙云集》下编之一，新竹：正闻出版社，1983版，第22页。

⑤ 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印顺文教基金会发行《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电子版。

⑥ 印顺：《印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55-158页。

张以五戒、十善净化自己，四摄、六度利益人群，强调“做好人”是学佛成佛的基础。同时他也强调，修行不能满足于“做好人”，还应修学菩萨行，认为“果真人人能够学菩萨行，行菩萨道……就是在当前使人们能够建立起高尚的道德品行，积极地建设起助人为乐的精神文明，也是有益于国家社会的，何况以此净化世间，建设人间净土！”^①

中国佛教在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必须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更好地挖掘和弘扬大乘菩萨精神，从而使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继续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精神动力，并在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①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6年，第215页。